

本土方法学的本体论及对社会学的意义^{*}

——基于对加芬克尔著作的解读

李化斗

摘要: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大陆社会学界,对本土方法学本体论的解读一直存在着极大的争议。在行动-结构维度上,加芬克尔的“形式结构”观以及从中提炼出的“亚结构”概念是对传统物化结构观的重要改进,这一点已经被当代理论所认识和吸收。但在更为根本的个人-社会维度上,目前对该学派存在比较严重的误读。从其主体间性理论、对“规则”的理解以及核心概念“成员”的内涵来看,该学派秉持了一种与主流社会学针锋相对的彻底个人主义立场。这一立场从渊源来看是胡塞尔早期“唯我论”思想的修正和演化。但这一“反社会学”立场无力动摇主流社会学的地位,其存在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与后者产生的张力和制衡促使其保持对自身知识生产风险的警醒。

关键词:加芬克尔 本土方法学 结构 个人主义 主流社会学

自20世纪末以来,在中国大陆社会学界,本土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①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有研究者指出,该学派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主要理论基础(赵万里,2000)、社会建构论的中坚力量(苏国勋,2002)以及社会学后现代主义转向的起点(刘少杰,2014)。然而,随着引介工作的深入,研究者日益迫近一个相当基础且重要的理论难题,即本土方法学究竟是社会学主流传统的颠覆者、继承者还是改良者?此问题本质上是对本土方法学社会本体论的明确判定。

即使在西方社会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存在很大的分歧,这体现在西方学者对本土方法学的不同态度上。一方面,当代新综合理论家如吉登斯(2003:101-109)、哈贝马斯(2004:106)等人都极为重视和吸收本土方法学的理论洞见,其中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甚。另一方面,科尔曼(Coleman,1968)、科塞(Coser,1975)、盖尔纳(Gellner,1975)、亚历山大(2000:201-202)等著名学者先后展开对该学派的激烈批评,并且如本土方法学家自己所承认的,即使在获得了相当的发展之后,该学派也未完全获得主流社会学界的认可,始终徘徊在社会学的“郊区”(Pollner,1991)。

与西方学者的巨大分歧和争论相比,中国大陆学界对本土方法学的现有解读存在一个明显的主导倾向,即认为该学派秉持了行动-结构或个人-社会维度上的综合立场,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当代新综合理论的先导(李猛,1999:81-84;袁同凯、袁兆宇,2016)。这无疑是一种相对安全的理解方式,因为至少可以获得吉登斯等人著作的支持。但问题是,这种理解无法充分解释该学派精神领袖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当年明确提出的本土方法学与主流社会学之间“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的立场(Garfinkel & Wieder, 1992),并且也难以解释为何在新综合趋势兴起之

^{*} 本文是天津市教委课题“常人方法学及其当代发展研究”(20132814)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① 大陆学界目前常见的译法是“常人方法学”。此译法有强调所有人(包括专家在内)都需借助“日常理性”之意,但缺点是忽略了加芬克尔使用“ethno”前缀对群体独特性、秩序局部/本土(local)性、互动情境性的强调,在后者意义上,笔者倾向于译为“本土方法学”。如果说在该词诞生初期,“常人”与“本土”两种涵义并存并构成了内在张力,那么随着该词在实际使用中获得自身的生命力,对“局部性”或“本土性”的强调最终占据了上风。

后,本土方法学仍保持其自身的强烈宗派性而未被同化的事实。

在上述意义上,对本土方法学的社会本体论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一、加芬克尔本土方法学的基本思想及其前后期的变化

(一) 加芬克尔本土方法学的基本思想

“ethnomethodology”一词是加芬克尔于1954年前后创造的,本意是对特定群体独有的“方法论”原则的研究,但在后来的发展中扩展为对行动者实践过程的研究(Garfinkel,1968)。

作为学派的创立者和精神领袖,加芬克尔的著作是理解本土方法学的首要文本,但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加芬克尔对学派性质和任务的明确界定却比较少见。较为明确的有两处:在1967年的成名作《本土方法学研究》(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中,加芬克尔指出,“本土方法学是对索引性表达和其他实践行动的理性属性的研究,这些理性属性是日常生活中有组织的巧妙实践所进行的权宜性的和持续进行的成就”(Garfinkel,1984: 11);在2002年的《本土方法学纲领》中,加芬克尔又提出,本土方法学的主旨是按照涂尔干的本意“社会事实的客观真实性是社会学的基本现象”展开研究(Garfinkel, 2002: 65 - 77),简言之,本土方法学是要回答“社会事实如何可能”这一问题。

两种界定使用了不同的术语,但其中都包含了强烈的反实在论和建构主义精神。

早期界定使用了语言学和逻辑学中的“索引性表达”概念作为立论基础。“索引性表达”指的是一个语句的意义只有联系到某一具体的语境才可以确定,与之相对的“客观性表达”则指的是一个语句的意义具有超情境性或者说客观性。加芬克尔认为,“索引性”应当是所有表达和行动的普遍属性,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属性却没有带来理解和社交中的根本困难,行动者总是以某种具体的方式赋予“索引性表达”以相对客观的属性。这一赋予客观意义的实践过程正是本土方法学的研究对象。

尽管由“索引性表达”引申出的行动的“索引性”这一概念今天已经成为社会学中较为著名的一个术语,加芬克尔后来却基本放弃了对它的使用。在2002年的界定中,作为立论基础的是主流社会学奠基人涂尔干的核心概念——“社会事实”。“社会事实”在涂尔干的界定中具有相对于个人的外在性和强制性特征,需要被当作客观事物来看待(迪尔凯姆,1999: 12 - 38)。但加芬克尔指出,与主流社会学的理解不同,“社会事实的客观真实性”并不是涂尔干为社会学设定的不言自明的前提,而是一种需要被解释的“基本现象”,社会学应当去解释“社会事实的客观真实性”何以可能,这也正是本土方法学的任务。言下之意,本土方法学与涂尔干一脉相承。

(二) 加芬克尔思想的前后期变化

上述两种界定最终都落脚于行动者的具体实践:正是实践赋予了索引性表达以客观真实性,也正是实践造就了社会事实的客观真实性。不过,在两种界定之间,加芬克尔思想有一个微妙且重要的变化过程。

虽然在早期的界定中,“实践”已经被确定为本土方法学研究的焦点,但对何为“实践”加芬克尔却缺乏明确的界定,而这几乎成为本土方法学所引发的所有争议和费解的渊藪。在笔者看来,“实践”在《本土方法学研究》中实际包含了两种不同的内涵:一是指行动者不加反思并且作为行动起点的先入之见,加芬克尔称之为“常识”或者在与帕森斯相近的意义上称之为“共享文化”(Garfinkel,1984: 76);二是指为了贯彻这种先入之见而采用的各种行动策略和行动过程。二者的综合被称为“解释的证指法”(documentary method of interpretation)(Garfinkel,1984: 77)“日常态度中的理性”(Garfinkel,1984: 269)等。

加芬克尔对“实践”两种内涵的实际兼顾,特别是将“常识”作优先关注的做法以主流社会学的立场来看,是一种值得赞赏的“综合”立场(亚历山大,2000: 189 - 190),并启发吉登斯(1998: 89 -

99) 提出了“实践意识”和“结构二重性”思想。按照这种解读,此时的加芬克尔不仅继承了帕森斯的思想,而且也是后来新综合理论的先驱。

但正如亚历山大(2000: 201)同时看到的那样,加芬克尔的这种综合立场仅仅是暂时的,在《本土方法学研究》中,一种朝向个人主义的倾向已经开始显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章中,加芬克尔进一步提出,社会秩序是“本土生产”(locally produced)和“自然可说明的”(Garfinkel, Lynch & Livingston, 1981),并且本土方法学和主流社会学是两种不可通约的秩序理论:主流社会学否认秩序的自然存在,认为秩序只有通过特定的理论和方法论规则才可以被建构或发现,而本土方法学则要在具体情境中追寻秩序的发生学起源(genetic origin)(Garfinkel & Wieder, 1992)。“发生学起源”一词意味着加芬克尔与帕森斯以及当代新综合理论的根本区别。对后者来说,由于有价值规范、场域等社会结构的预先存在,行动者的具体行动过程实质是社会的“再生产”;而“发生学起源”的意思是,秩序是在具体行动过程中、从零开始发生的,并不需要任何超情境的社会结构或秩序的预先存在。《本土方法学纲领》一书体现了转变完成后加芬克尔对本土方法学的最终理解。此时的加芬克尔更试图用秩序的“发生学起源”这一立场来颠覆或者重构涂尔干的思想也即主流社会学的基础理论。

如果说秩序的“发生学起源”颠倒了主流社会学那里结构先于行动、社会先于个人的关系,那么,社会还如何可能?进而,社会学如何可能?下文将从行动-结构和个人-集体两个维度对本土方法学的内在逻辑进行解读。

不过,在这里需要对区分两个维度的做法作一补充说明。在主流社会学即涂尔干-帕森斯的理论脉络中,行动-结构和个人-社会尽管是两个不同的维度,却往往可以不必加以区分,因为按照主流社会学的立场,结构既具有独立于行动的客观性,同时也具有独立于个人的集体性或社会性,反之亦然,即结构和社会往往是合一的。这一点典型体现在涂尔干对“社会事实”的论述中:社会事实是集体互动的产物,同时也具有外在性和强制性这些结构特征。帕森斯的“价值系统”、布迪厄的“场域”也循此逻辑。但严格说来,主流社会学的这种看法并不具有逻辑必然性,因为行动-结构和个人-社会两个维度本质上针对的是不同内容,从而存在两两交叉的可能性,其中较为常见的可能是,既可以立足个人谈行动-结构(如心理学),也可以立足社会谈行动-结构(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两个维度的区分对本土方法学来说具有实质意义,因为下文将会证明,本土方法学所说的“结构”并不自然地具有“社会”性。

二、本土方法学的结构观

在本土方法学之前,社会学上对“结构”大致有两种理解和使用方式:一种是按照字面意义进行的最宽泛界定,即“结构”是能对行动起制约或条件作用的各种要素(Scott, 2006: 3)。按这种宽泛的理解,“结构”既可以是涂尔干和帕森斯意义上的超越个体的“社会事实”,也可以是结构主义那里人类普遍的认知图式,或者是弗洛伊德提出的意识分层模式,甚至是从康德到胡塞尔的主体哲学所探索的先验认知形式,等等。另一种是主流社会学对“结构”的理解,即“结构”等同于“社会结构”,其涵义基本等同于涂尔干所说的“社会事实”,兼具对行动的制约性和超越于个体的集体性。本土方法学的结构观与当时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社会构成了直接的对话关系。

(一) 加芬克尔对“结构”的理解

加芬克尔本人并不排斥使用“结构”一词,但为其赋予了不同于主流社会学的新涵义。

在《本土方法学研究》中,通过著名的“夫妇谈话”实验,加芬克尔指出共同理解中包含某种“结构”,但这种“结构”并非实质性的“常识”/“共识”,而是一种操作结构(operational structure)。操作结构是一种形式层面的属性,指互动双方都会设定/假定对方的表达服从某种规则,并进而根据这种假定的规则对对方表达的涵义进行推测;互动双方是靠这种假定与推测模式,而不是实质意义上

的共识来达成相互理解的(Garfinkel, 1984: 31)。

之后,在与萨克斯合著的文章中,加芬克尔改称“操作结构”为“形式结构”,并通过后者串联起早期使用的一系列不同术语。实践的“形式结构”也就是为“索引性表达”赋予客观属性的方法,是“对自然语言的精通”“注解”(glossing)以及“成员方法”(Garfinkel & Sacks, 1970)。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强调本土方法学关注的是“形式结构”而不是“实质结构”,加芬克尔专门发明了一个概念——“本土方法学无涉”(ethnomethodological indifference)。这一术语指的是,本土方法学并不关心被研究对象——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专家——表达或行动的“内容”,即不关心其价值倾向、手段目的合理性、后果等等,而只关注其表达或行动在形式层面展示出的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可复制性的特征。

“形式结构”概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本土方法学像人类学一样,致力于探寻全人类的共性,并且“本土方法学”一词的起源的确与人类学有莫大的关系。这种倾向似乎与本土方法学对群体独特性、秩序具体性和本土性的强调产生了矛盾,或者说,实践的“形式结构”与实践的“情境性”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尚未被本土方法学家自身和研究者所重视和探讨的问题。不过,如果这一矛盾能被理解成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加芬克尔本人的立场是比较明确的,即本土方法学以揭示秩序的“发生学起源”也就是具体性和特殊性为目标,而不以追求普遍化和形式化解释为目标。加芬克尔提出并讨论实践的“形式结构”但并不以此为最终目的,毋宁说,在他看来,本土方法学的目标是揭示这种“形式结构”的具体表现。当然,并不排除其他本土方法学家有反其道而行之的追求——实际上,波勒纳对“世俗理性”(Pollner, 1987)的探讨已经体现了追求形式解释的倾向,但对加芬克尔来说,本土方法学始终是一个彻底经验取向的流派,以发现和揭示新的经验内容为目标,“形式结构”一词的意义在于提示和概括本土方法学的研究主题而非取代后者。

(二) 希尔伯特和波勒纳对“结构”的理解

加芬克尔在“结构”问题上的立场深深影响到其他本土方法学家,但部分源于加芬克尔本人的反理论倾向,其“形式结构”概念并未成为学派的规范用语,其他本土方法学家在理解和使用“结构”一词时仍呈现出很大的任意性。在加芬克尔之外,至少还可以辨识出两种对“结构”的不同理解和使用方式。

第一种见于希尔伯特(Hilbert),明确主张本土方法学不应该也不必要有“结构”概念。希尔伯特认为,主流社会学视为“结构”的东西,无论是像阶级这样的“宏观结构”,还是像性别认同这样的“微观结构”,都应该是被研究的论题(topic),而不是解释的前提或资源(resource);二者都是由“实践”或“本土方法”所建构的(Hilbert, 1990: 795)。这种观点在实质上延续自加芬克尔。但希尔伯特进一步认为,“本土方法”尽管由个人体现,却是一种外在于个人并对个人施加制约作用的因素,也因此是一种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事实”(Hilbert, 1990: 796)。这意味着希尔伯特在否定传统“结构”概念的同时又将“社会事实”这一“结构”的近义词引入进来;同时,这种立场和加芬克尔在《本土方法学纲领》中致力于“解构”“社会事实”的做法也大相径庭。在上述意义上,可以说,在实际立场上,希尔伯特试图融合加芬克尔的形式结构观与传统的物化结构观,但在用语上,依然是用主流社会学的方式理解“结构”一词。

第二种理解见于波勒纳(Pollner),主张本土方法学实际秉承着一种“亚结构”意识。波勒纳看到了加芬克尔在《本土方法学研究》中对“实践”或“本土方法”的二重界定,但他的关注重点是其中的“假定”部分:行动的“假定”本身就是一种“亚结构”(Pollner, 1991: 371)。之所以是“亚结构”,也是参照和相对于主流社会学的物化结构而言的:“假定”像帕森斯所理解的价值规范一样主导着实践的方向,但其本身却是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的主观设定。可以说,波勒纳在继承加芬克尔思想的同时,在用语上保留了主流社会学在“结构”一词上的实质内涵。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波勒纳对“亚结构”的强调留下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亚结构”的起源,该问题直接关涉到社会本体论上的个人-社会关系,下文讨论也将重点围绕此问题展开。

(三) 本土方法学结构观的意义与影响

尽管存在传统社会结构观的残留(如希尔伯特),本土方法学还是开辟了对结构问题的新理解。在这种新理解中,结构要么是一种形式层面的特征(加芬克尔),要么在实质意义上是一种存在于行动者主观层面的“亚结构”。二者都不同于传统的以“社会事实”理论为代表的物化结构观。

这种新的结构观特别是“亚结构”概念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吉登斯等新综合理论家改造传统社会本体论的重要思想基石。在吉登斯那里,“结构”已非外在之物,而是作为“记忆痕迹”存在于行动者的意识系统中,同时构成行动的中介和结果。在布迪厄那里,“惯习”同样是一种身体化的结构。不过,也正是这种思想关联造成了本土方法学是社会思想史上的过渡学派的印象。

但必须要看到的是,吉登斯和布迪厄等人接受本土方法学的新结构观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以保留物化结构观为根本前提。

在吉登斯那里,这一前提表现在,默认存在“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且为了研究后者,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悬置”行动本身。“只要我们认识到,所谓集中研究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只不过是受到反思性监控的社会行为悬搁起来(即暂时中止考虑),那么这种‘集中研究’就不失为一种正确有效的步骤……”(吉登斯,1998: 96)。作为对比,在胡塞尔、舒茨和加芬克尔那里,“还原”或“悬置”的对象无一不是物化的“结构”,经过“还原”处理得到的结论则是“纯粹意识”“自然态度”或者“实践”。这一看似无关紧要的说明实际是一种意义重大的倒转。正是基于此,吉登斯才能在吸收本土方法学的同时,接续社会学的传统,建构有关现代性的宏大“事实”理论。

在布迪厄那里,情况更为清楚。“惯习”总是与“场域”相伴的,后者在本体论上要优先于前者(布迪厄、华康德,1998: 172、181)。“惯习”概念所体现出的新结构观不过成为物化结构观和社会决定论的一个补充,这种处理方式和帕森斯的价值规范内化理论本质上并无二致。

那么,关键问题就在于,本土方法学那里的“亚结构”即实践中的“假定”从何而来。如果这种“亚结构”归根结底还是起源于外在物化结构(布迪厄)或者可以被化约为一种外在结构(吉登斯),那么吉登斯和布迪厄的保守立场就是合理的,并且本土方法学最终也不过是主流社会学的一个补充。对主流社会学来说,“亚结构”与物化结构的关联几乎是不证自明的。然而,在本土方法学那里,“亚结构”的起源问题并未被如此断言。这涉及到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本体论维度,即个人-社会关系。

三、加芬克尔的个人-社会观

(一) 主体间性的达成: 共识路径、互动路径与个人路径

再次回到著名的夫妇谈话实验。加芬克尔不仅在这个实验中提出了“操作结构”概念,而且更通过这一实验表达了对社会、互动和个人三者关系的不同理解。

这一实验的主题是探讨“共同理解”的本质。加芬克尔让学生首先遵从帕森斯式的解释路径,即通过价值规范内化方式解释共同理解的可能性。按此思路,谈话双方之所以能够顺利交流,是因为预先分享了某些外在价值规范或者信息,因此,只要努力挖掘,作为第三方的观察者必然能够将这些预先的“共识”揭示出来。但实验证明,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表达的无限索引性,每一次对“共识”的揭示都会引发更为基础的、需要进一步揭示的“共识”,而作为逻辑起点的“共识”始终是不可得的。既然如此,那共同理解何以可能?

加芬克尔继而提出了第二种解释思路,即以对话方法的观察代替对谈话内容的挖掘,“辨别一个人说话的意义仅在于也完全在于辨别他说话的方法,在于辨别(对方——笔者所加)看他说话的方法”(Garfinkel, 1984: 29)。如前所述,这种谈话方法实际上遵循着一种“操作结构”:双方互相假定对方都遵循某种谈话规则,并在此基础上动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对对方的谈话进行补充和赋予意义,并通过表达进行验证和调整。如果说存在某种作为起点的“共识”的话,那就是双方都会假定对方是理性的或者说对方会遵循这个场合下“恰当”的规则(Garfinkel, 1984: 30)——当然,这种

“规则”的内容取决于每个谈话者本人的理解。这意味着互动并不以任何一种主流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质“共识”为起点。但这不妨碍互动能够有序地进行,并且互动双方都认为“理解”了对方。

对本土方法学来说,帕森斯意义上作为社会存在的价值规范是要首先放到括号里的,经验研究所能看到的只是行动者对这种“社会存在”的“假定”以及在这种假定基础上进行的不间断的试错过程。本土方法学这一立场的基础实际是舒茨所论及的个体意识系统的封闭性:我无法进入对方的意识流,否则“你我就是同一个人”(舒兹,1991:122)。个人意识的封闭性决定了所谓的“共同理解”即主体间性的实现本质上是个人的自我判断,并且始终是暂时的,随时有遇到反面证据的可能。以“共识”形态存在的“社会”不仅被剥夺了解释者的位置,甚至其存在也成为可疑的,或者说,如果“共识”意义上的“社会”能够存在,也只能出现在行动者对互动过程的事后“说明”中(Garfinkel, 1984: 6-7)。

如果仅就上述讨论就得出本土方法学是一种本体论个人主义仍旧是草率的,因为对这一实验仍然可以有一种互动本体论的解读。这一立场的代表是埃利亚斯的个人与社会交织论以及米德所开创的符号互动论。以此立场看来,谈话者所得到的意义由互动过程决定并随着后者改变而改变。尽管以“互动”取代了传统的“结构”,这一立场仍然试图为意义找到一个外在的和集体的依据,并坚决否定个人可以成为意义之源。埃利亚斯(2006:46)认为,不能从单个的个体出发去理解个体之间的联系构造……而是相反……必须从个体之间的联系构造出发,去理解单个人的“心智”构造。米德(2008:6,43)也认为社会心理学的合理路径是从群体整体出发分析个人,而不是反之;意义来自于互动,意义先于个人的自我意识;语言作为社会决定的符号其对所有成员具有相同的意义。加芬克尔则坚持互动本身可以被化约为个人的猜想和试错过程,并且意义的共同性并没有任何超越个人的保证:他人的确能够提供反馈,但对这种反馈的解释最终是由行动者个人完成的,并且始终存在“误读”和被证伪的可能;所谓“共识”或“相同理解”只能是行动者对自己所持理解和他人相同的一种“信任”或“期待”,而不是可以由互动本身决定的客观存在。站在本土方法学的立场,互动本体论尽管也试图超越物化社会结构观,却仍在延续后者的逻辑。本土方法学一度曾被看作符号互动论的分支,但二者的区别在此可见一斑。

(二) “假定”的起源或者规则问题

对上述讨论的一个可能质疑是,夫妇谈话实验选择的是一个随意的场景,即这里不存在明确的规则,特别是以书面形式存在的规则。在有明确规则的前提下,规则能否决定行动者的“假定”或者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予以限定呢?这一质疑的实质是规则所代表的社会结构与实践中“假定”的关系问题。

以下棋为例,加芬克尔(Garfinkel, 1963)探讨了“规则”在实践中的贯彻问题。加芬克尔发现,游戏规则是通过转化成游戏者的“基本期待”——同时也是对对方的“信任”——的方式来产生作用的。当实验者故意违反规则时,被试一方的反应是不同的:有人坚持对规则的已有理解,从而感到恼怒;有人则把实验者的行为当作玩笑,从而重新理解棋局的意义。这种“破坏试验”已经隐约揭示出,规则的效力取决于行动者对贯彻规则时的“背景”或者“语境”的判定,而这是规则本身无法决定的。

在《本土方法学研究》中,加芬克尔将研究指向了被认为最具严格性的科学活动。他发现,在对调查资料的编码活动中,编码并非机械的应用编码规则,而是需要大量的“额外操作”(ad hocing),即编码员需要主观判定某一资料在编码指南上的意义;而有意思的是,编码员进行这种判定的依据是自己对研究对象的某种预判。从而,本来应由编码和研究本身来发现的结论却成为编码和研究得以进行的前提,即被解释物变成了解释物,形成了某种循环论证(Garfinkel, 1984: 22-24)。

上述两个案例可以表明,在本土方法学看来,即使存在明确而客观的“规则”,这种规则也无法自然地转化成行动者在实践中的“假定”,从而解决行动的定向和双重偶然性问题。“假定”的形成作为实践过程的一部分,和“策略”一样都是行动者自己的创造或“成就”。

割断“规则”与“假定”之间的自然联系意味着本土方法学恢复了被主流社会学特别是帕森斯价值内化理论轻易打发或掩盖的复杂问题,更进一步说则是本体论逻辑从以社会为核心转向以个人为核心。这里也可以看到加芬克尔对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吸收。^①这一立场赋予了实践者必然的自决地位,并与社会学奠基时期齐美尔笔下永远不可能被社会完全吞噬的个体遥相呼应。

那么,能否推出本土方法学是彻底的反规则和反结构,主张“正式规则无用论”呢?如果是,本土方法学该如何解释现代社会以法律为代表的正式规则越来越多这一现象?从上文讨论中可以看到,本土方法学已经从本体论上排除了传统的“结构”和“正式规则”的解释力,但同时加芬克尔还有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即“规则”尽管不能决定行动过程,却可以被行动者用来作为“说明”自己行动的借口(Garfinkel, 1984: 6-7)。维德尔(Wieder, 1974)对“罪犯守则”(convict code)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即使现代社会越来越充满正式规则,在本土方法学看来,可能的解释并不是现代社会秩序依靠规则得以可能,而是在现代社会行动者之间需要进行彼此说明的情境越来越多,甚至是跨越时空的说明。^②

但上述论述仍然面对疑似反面证据带来的挑战:如有研究者(袁同凯、袁兆宇, 2016)认为,本土方法学对“成员”概念的使用足以证明其并非一种个人主义或主体哲学,而是在本体论上与主流社会学保持着一致。

(三) “成员”概念再解读

加芬克尔在《本土方法学研究》的一个脚注中表示,“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严格地遵从帕森斯的意思”,并且具体解释到,“成员”即“集体成员”(collectivity member)的简称,成为一名合格“成员”的关键是对日常生活抱有与他人相同的“背景期待”或“对社会结构的常识知识”(Garfinkel, 1984: 57)。的确,加芬克尔这里所说的“结构”并非其在本书其他地方重点论述的“形式结构”,而是沿用了帕森斯对结构的理解。

据此似乎非常容易得出结论,加芬克尔继承了帕森斯的价值内化理论以及主流社会学的社会实在论。但问题并非这么简单。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加芬克尔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明确主张本土方法学与主流社会学的对立的,在此之前,包括在成名的《本土方法学研究》中,他对帕森斯和主流社会学的态度是暧昧或游移不定的。这表现在他一方面批判主流社会学把行动者变成了“判断呆子”(Garfinkel, 1984: 66-67),另一方面却又对帕森斯理论的穿透力表示欣赏(Garfinkel, 1984: ix)。对“成员”概念的这种借用和说明的确表明加芬克尔在向帕森斯理论“示好”,但不可忽视的是,此时加芬克尔对后者的批判态度以及之后立场的激进化。

更重要的是,即使承认这种“示好”,我们也可以发现,加芬克尔在不经意间实现了对帕森斯本体论和问题意识的改换。在帕森斯那里,价值规范系统是一种客观存在,同样由价值内化而形成的“背景期待”也是一种客观的标准和要求,是社会学家可以观察和推测的。但在加芬克尔的表述中,合格“成员”所要达到的背景期待的一致性却并非如此。加芬克尔借用舒茨的理论指出,这种背景期待的一致性首先是行动者个人的一种三重假定:自己作出某种假定,自己假定他人也作出相同假定,自己假定像他对他人作出假定一样他人也对自己持有相同的假定。假定之后则是证明:行动者要向作为见证者(witness)的他人展示自己对事件的理解和他们一致,而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① 维氏指出,词的意义是由它的全部使用来决定的;规则无法预先规定在具体场景的每一点上实践者该如何行动,反而是,“公式被意指的方式决定了要采取的步骤”(维特根斯坦, 2007: 139、186、190)。

^② 由此可以归纳出本土方法学对人性内在张力的揭示,即每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情境下,但却都要为这一具体过程披上一种“结构”或“规则”的外衣。波勒纳(Pollner, 1987)后来把这一特征称为“世俗理性”。但无论加芬克尔、维德尔还是波勒纳都没有提供对这种“结构”或“规则”倾向的最终解释。吉登斯后来从心理学那里借用“本体性安全”概念算是把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向前推进了一步。

(Garfinkel, 1984: 55)。而“根据定义,对假定的每一方面,意外总是可能的”(Garfinkel, 1984: 57)。在上述意义上,一个有能力的或者真正的(bona - fide) 成员本质上是一个对自己的假定持有信心的行动者,而非研究者可以依据某种外在规范加以评判的。“破坏实验”正是证明,成员的这种自信很容易被他人的反应所破坏,并进入混乱和再恢复过程。这表明,加芬克尔的“成员”概念虽然来自帕森斯,但在实际理解上遵循的已经不是价值内化的路子,而是现象学式的思维。二者最直接的区别在于,在成员是否有能力或者合格的问题,前者持“客位”,而后者持“主位”立场。这也符合加芬克尔提出的“本土方法学无涉”原则。

这种判断引发的一个疑问是,加芬克尔为什么不直接用“行动者”一词,而一直使用极易引发相反理解的“成员”一词,而且直到其学术生涯晚期仍然如此? 对此,笔者认为或许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加芬克尔对“成员”一词的借用虽然发生在其思想没有定型时期,但在本土方法学内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习惯和传统,因而得以延续;二是出于对主流社会学的不满,加芬克尔一直强调研究论题和资源的区分——前者是解释的对象,后者是解释的依据,并认为主流社会学往往错把论题当作资源。由此可以推测,在去除了其实在论内涵后,“成员”概念虽然已不再是一种解释的资源,但却仍然指示着一个研究的论题,即“成员”是如何可能的,而这一论题正是对本土方法学问题意识的另一种概括。由此,“成员方法”也已不再是“社会结构被内化和贯彻”的方法,而是“行动者对结构作出当下判断并据此行动和互动”的方法。

四、本土方法学个人主义立场的现象学渊源

以上讨论的初步结论可以概括如下:本土方法学提出了以“形式结构”或“亚结构”为内涵的新结构观,而这种新结构观进一步从属于一种彻底的个人主义本体论。

这一初步结论虽然不同于国内学界的主流看法,但却并非没有外部证据。事实上,一些主流社会学理论家早已在批判意义上得出了与本文相似的结论。亚历山大(2000: 202 - 203) 认为,从《本土方法学研究》开始,加芬克尔就逐渐放弃了早期从帕森斯那里继承的综合倾向而转向个人主义;他把这种转变的原因归结为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吸引青年学生的需要。布迪厄(布迪厄、华康德,1998: 104) 在评论本土方法学时,既赞赏后者在主体性层面进行的分析,又批评后者是“严格的现象学的方式”思维,完全忽视了主观态度的来源即外在的权力结构问题。盖尔纳(Gellner, 1975) 则更为深刻地指出,加芬克尔的本土方法学是华生的行为主义的反转,是贝克莱、胡塞尔的“内在”解释潮流或者说是唯心主义传统的延续,也是美国战后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所造就的主体性崇拜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判者尽管坚决拒斥个人主义,却几乎不去论证为何个人主义或者主体哲学在社会学上是一种“错误”。这种自明态度恰恰反映了社会实在论在社会学上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学科无意识,更突显出本土方法学的个人主义和反社会实在论立场的颠覆性。

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在社会实在论的强大传统中,本土方法学的个人主义从何而来? 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加芬克尔个人的思想经历有关。事实上,加芬克尔虽然极为反对其学生进行纯理论研究,但其本人却极为重视对已有哲学和社会理论的吸收,帕森斯、后期维特根斯坦以及现象学都在其阅读之列,尤其是后者(Liberman, 2013: 4)。在很大程度上,加芬克尔的个人主义立场正是胡塞尔早期“唯我论”立场修正和演化的结果。

加芬克尔在《本土方法学研究》时期就把胡塞尔列为最主要的思想来源之一,但根据胡塞尔的最初设想,现象学的本体论是“唯我论”而不是个人主义。根据严格的逻辑主义原则,胡塞尔认为所有的实在论观念(当然也包括社会实在论) 都是要被悬置的,而最终得到的结论是,只有“纯粹自我和纯粹意识”才是知识不可动摇的基础。然而,这种“唯我论”立场与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的存在前提——他人的实存——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当胡塞尔试图从“唯我论”立场出

发推导出他人的实存从而为社会科学提供哲学基础时,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①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胡塞尔在后期的生活世界理论中放弃了早期的严格逻辑主义,把他人实存和主体间性视为社会成员的一种“自然态度”;对这种自然态度的立场不再是怀疑和悬置,而是承认和描述。在这种自我修正中已经暗含了从“唯我论”向个人主义的关键过渡。

舒茨将胡塞尔的后期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了一套基于个人意识封闭性的实用主义主体间性理论,并在流亡美国后通过与加芬克尔的交往对后者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舒茨明确表示,他吸收的是胡塞尔的后期思想即“自然态度的构成现象学”,而不是早期的先验现象学(Schutz, 1962: 149)。“自然态度的构成现象学”在本体论上被舒茨阐发为一种有限度的不可知论(Heritage, 1984: 60),即在承认他人实存的同时,又坚持个体之间意识的封闭性(舒茨, 1991: 122)。这是一种介于唯我论与社会实在论之间的立场,实质即个人主义。这种本体论不仅用于说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普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也适用于对社会学家与其研究对象关系的说明。基于这种个人主义,舒茨认为主体间性问题是行动者之间通过实用主义方式解决的。这种解决方式主要包括“手头的库存知识”(stock of knowledge at hand)和“普遍的交互视角命题”(general thesis of reciprocal perspectives)两部分。前者指行动者总是倾向将一个对象归入某种他已熟悉的类别——这种归类尽管未必是永远有效的,但足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后者则是说,行动者相信他们的视角如果互换,看到的東西将会一样,并且视角的差异对达成实践目标并不产生影响。

加芬克尔的本土方法学实际是对胡塞尔后期思想和舒茨理论的一种经验性应用。和二者一样,加芬克尔首先悬置了社会实在作为解释性因素的位置,而只承认行动者个体,并且是意识封闭的个体。沿着舒茨的实用主义主体间性理论,加芬克尔继续追问:行动者如何利用“手头库存知识”形成具体的行动“假定”?如何贯彻这种“假定”,特别是在“交互视角命题”遭遇挑战的情况下?这些追问凝聚成本土方法学的“实践”理论和对“成员方法”的关注,并在经验研究上实现了社会学研究主题的无限扩展。

需要指出的是,在舒茨那里,不可知论与追求普遍解释力的自然态度理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矛盾,这反映出与“唯我论”背后的严格逻辑主义相比,后期胡塞尔和舒茨理论具有不彻底性或者朴素性。这种朴素性也延续至本土方法学。正如哈贝马斯(2004: 124)敏锐发现的,本土方法学的激进反思立场会让其本身陷入自我指涉悖论从而瓦解自身的有效性。为此,持“左倾”立场的本土方法学家如波勒纳认为,该学派只能坚持其激进反思的立场,不间断地进行自我革命(Pollner, 1991)。

五、本土方法学对社会学的意义

如果说社会实在论构成了社会学这一学科的形而上学基础乃至合法性依据,那么本土方法学毫无疑问可以被称为一种“反社会学”,其对社会学上的长期边缘地位或多或少也证明了这一点。不过依旧能够获得生存空间这一点也同时证明,该学派有自身的合理性与价值所在。然而该学派对社会学的意义并不仅限于甚至主要不在于为新综合理论提供思想准备。如上文所论证的,和主流社会学从社会到个人的本体论逻辑相比,本土方法学从个人到社会的推演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范式,当代新综合理论无法完全接纳这种范式。更重要的是,这种思想范式虽然在德国理论家如齐美尔和滕尼斯那里有所萌芽,却只有到本土方法学这里才发展成为一种能够与主流社会学相抗衡的独立经验研究学派。基于这种定位,可以重新审视本土方法学对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的意义。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本土方法学与主流社会学之间呈现出了三种可能的关系。

其一,主流社会学尝试吸收和同化本土方法学。这以吉登斯等新综合理论家为代表,并且也影

^① 这一推导使用了“同感”等外加概念(胡塞尔, 1997: 884-933),严格说来并非从“自我”出发的逻辑演绎,而是对普通人现实心理经验的承认和描述,即违背了逻辑主义原则,没有避免朴素性,或者说“证明了过多的东西”(施皮格伯格, 1995: 209)。

响到大陆社会学界对本土方法学的理解。如前所述,这种吸收是以保留社会实在论为自明前提的。该类研究者虽然对本土方法学表示了极大的赞赏和同情,但并未看到本土方法学与主流社会学之间的张力以及这种张力具有的意义。本土方法学在新综合理论时代仍固守其宗派性的事实表明了其对这种单方面热情的冷漠态度。

其二,本土方法学尝试取代主流社会学。加芬克尔宣称本土方法学与主流社会学是两种不可通约的秩序观,将主流社会学视为和普通人立场一样的“朴素”知识观以及晚期著作中对涂尔干名言的解构,都体现了这一企图。但事实是,尽管本土方法学对主流社会学朴素性的批判并非不无道理甚至是振聋发聩,主流社会学的主导地位却并没有动摇。这一事实也足以引发本土方法学家和研究者的反思:为何主流社会学具有如此大的朴素性却仍然屹立不倒?本土方法学的反思性更强却为何不能成为社会学的主流?

其三,本土方法学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以及对主流社会学的批判,但同时依附和服务于后者。这种看似矛盾的立场体现在林奇(Lynch, 2010: 57)的下述论断中:“在一定意义上,本土方法学是社会学宿主学科的一个寄生物,但是不同于只向它的宿主产生一种无生命的空壳的寄生物,本土方法学尝试重新赋予那些无生命的表现以活力——这些无生命的表现源于一种对其自身‘生命’生产的形式化分析。”林奇认为,一方面,本土方法学与主流社会学在本体论上是不可调和的,前者始终对后者的“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观”进行批判,但另一方面,这种批判并没有颠覆后者而是重新赋予了后者以活力。

笔者认为,林奇所提出的第三种关系模式正是对本土方法学意义的恰当定位。

首先要承认的是,社会实在论及其变种在社会学上的主导地位有其背后的合理性。在本土方法学看来,主流社会学和普通人的日常观念具有同样的朴素性——用舒茨的话说,即主流社会学属于“一阶构造”,而现象学社会学和本土方法学属于“二阶构造”,但需要强调的是,正是这种朴素性和“一阶构造”构成了社会学的合法性基础。从社会学的起源来看,面对社会问题、经世致用是外界对于社会学的期待。这要求社会学不得不与其研究对象具有相似的问题意识以及相同的本体论假定,舍此则无社会学。

但同样要看到的是,即使是必要的,朴素性的思维方式也必然有其风险。主流社会学预设的社会实在其实并不具有被假定的那种自然性和客观性。现象学称这种实在论信念为“自然态度”,而本土方法学则具体揭示出这些自然性和客观性是如何被人为构造出来的。事实证明,现象学和本土方法学虽然不能动摇社会实在论的主导地位,但却可以提供持续的批判,以使后者保持对自身知识生产所蕴含风险的警醒——在这个意义上,本土方法学类似社会学这一机体上的“牛虻”。这正是本土方法学虽然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却始终不能被主流社会学完全忽视的根本原因。

由上也可以推想,社会学理论的理想状态并不是在本体论上——尤其是在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达成完全的统一,而是保持两种或更多不同立场之间的张力和制衡。但作为前提,这需要保证不同立场尤其是弱势一方的生存空间,而包括新综合趋势在内的种种统一运动很可能事与愿违地造成了对非主流立场的误读、扭曲和压制,并影响到社会学的整体活力。

参考文献:

- 埃利亚斯,2006,《个体的社会》,翟三江、陆兴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布迪厄、华康德,1998,《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迪尔凯姆,1999,《社会学方法的规则》,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哈贝马斯,200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 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胡塞尔,1997,《〈笛卡尔的沉思〉第五沉思》,载倪梁康选编《胡塞尔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吉登斯,1998,《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田佑中、刘江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猛,1999,《本土方法学》,载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林奇,2010,《科学实践与日常活动》,邢冬梅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 刘少杰,2014,《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米德,2008,《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施皮格伯格,1995,《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舒兹,1991,《社会世界的现象学》,卢岚兰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 苏国勋,2002,《社会学与社会建构论》,《国外社会学》第1期。
- 维特根斯坦,2007,《哲学研究》,蔡远译,北京:九州出版社。
- 亚历山大,2000,《社会学二十讲》,贾春增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袁同凯、袁兆宇,2016,《成员与社会秩序:本土方法学的社会结构观》,《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赵万里,2000,《建构论与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Coleman, J. S. 1968,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Book Review)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33) .
- Coser, L. A. 1975, "Two Methods in Search of a Substance.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0) .
- Garfinkel, H. 1963, "A Conception of, and Experiments with, "Trust" as a Condition of Stable Concerted Actions. " In O. J. Harvey (ed.) , *Motiva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New York: Ronald Press.
- 1968, "The Origins of the Term 'Ethnomethodology. " In Roy Turner (ed.) , *Ethnomethodology: Selected Readings*, Penguin Education.
- 1984,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2002, *Ethnomethodology' s Program: Working Out Durkheim' s Aphorism*.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Garfinkel, H. & D. L. Wieder, 1992. "Two Incommensurable Asymmetrically Alternate Technologies of Social Analysis. " In G. Watson & R. M. Seiler (eds.) , *Text in Context: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Newbury Park: Sage.
- Garfinkel, H. & H. Sacks 1970, "On Formal Structure of Practical Actions. " In J. Coulter (ed.) , *Ethnomethodological Sociolog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 Garfinkel, H. , M. Lynch & Livingston 1981, "The Work of a Discovering Science Construed with Materials from the Optically Discovered Pulsar. "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 (11) .
- Gellner, E. 1975, "Ethnomethodology: The Re-enchantment Industry or the Californian Way of Subjectivity. "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4 (5) .
- Heritage, J. 1984, *Garfinkel and Ethnomethod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ilbert, R. A. 1990, "Ethnomethodology and the Micro-Macro Order.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 (55) .
- Lieberman, K. 2013, *More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Pollner, M. 1987, *Mundane Rea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1, "Left of Ethnomethodolog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Radical Reflexivity.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 (56) .
- Schutz, A. 1962, "Husserl' s Importanc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 In M. Natanson(ed.) , *Collected Papers (I)* . London: Martinus Nijhoff.
- Scott, J. (ed.) 2006, *Sociology: The Key Concepts*. New York: Routledge.
- Wieder, D. L. 1974, "Telling the Code. " In Roy Turner (ed.) , *Ethnomethodology*. Harmondsworth: Penguin.

作者单位:天津理工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石金群

Keywords: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Vocational School Education Enterprise Training Self-lea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Opportunity for Social Mobility *Sun Beibei*(65)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academia has paid high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s regarding the solidification of social class structure and the constraint of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social mobility. It is regarded that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kind of solidification is the status of inequality in the fields of education, employment, etc. In fact,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especially the adjustment of economic structure is the more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developing the bigger space of social mobility space and the opportunity for social mobility, especially in the areas where the economy is relatively underdeveloped but in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Take the Fenghuang county in Hunan as atypical case,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tourism industry in poor area on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opportunity for upward mobility.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merging tourism industry could bring about the expansion of service industry, provide the large amount of new employment positions for the disadvantaged group in poor areas, improve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distribution in employment and career structure, broaden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channel of social mobility in society, and increase the opportunity for short-distance social mobility or even the possibility of long-distance social mobility.

Keywords: Disadvantaged Group Tourism Industry Social Mobility

The Ontology of Ethnomethodology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Sociology *Li Huadou*(73)

Abstract: In the sociology circle of both the West and Mainland China, there has always existed great controversy over the explanation on the ontology of ethnomethodology. In the dimension of action-structure, Garfinkel's concept of "formal structure" and the extracted concept of "substructure" are the important improvements of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reified structure", which has been recognized and absorbed by contemporary theories. However, in the more radical dimension of individual-society, currently there exists serious misunderstanding of this school. Regarding its theory of inter-subjectivity, the understanding of rules and the connotation of its core concept "member", this school upholds a radical position of individualism, which is diametrically opposed to mainstream soci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igin, this position is the revision and evolution of Husserl's early idea of "solipsism". But this position of "anti-sociology" couldn't shake the status of mainstream sociology. Through the tension and balance with mainstream sociology, this position could prompt the mainstream sociology to keep alert of the risk in its own knowledge production. This is 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its existence.

Keywords: Garfinkel Ethnomethodology Structure Individualism Mainstream Sociology

The Study on Thai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ereotypes about Chinese People *Supawadee Sae-sue & Shan Yunming* (84)

Abstract: Based on the two-stages' investigation of Thai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Guangzhou area, this paper tries to examine the content, direction and intensity of their stereotypes about Chinese people, and explore the influences of such factors including the duration of stay in China, the level of Chinese proficiency, whether ethnic Chinese or not, and the degree of knowledge about Chinese culture, etc.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e Thai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ve both positive stereotypes and negative stereotypes about Chinese people. There are more positive stereotypes than negative stereotypes, and the intensity of positive stereotype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negative stereotypes. "Studiousness" is the most profound positive stereotype, and "vulgarity" is the most profound negative stereotype. Whether ethnic Chinese or not ha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ith positive stereotypes about Chinese people, and the degree of knowledge about Chinese culture ha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ith positive stereotypes and negative stereotypes. Finally,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cause behind the stereotypes.

Keywords: Thai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ereotypes Chinese People Ethnic Chinese